

情望諦中亦家之南威
之字乃之於法媛有
龍泉之如後漢於如
審後過其外字大庭
其字盡因化出為古
其字亦如之於中

張瑞圖
《行草王世貞國朝詩評卷》
1624年
上海博物館藏

張瑞圖（1570-1641） 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

何炎泉*

【摘要】晚明四家中的張瑞圖，因為其特殊的行草書風，雖然已經受到不少學者所關注，也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卻依舊無法釐清其風格來源。文中首先檢討過去研究者所提出的角度，採取不同的觀點與方法，試圖說明張瑞圖書風與孫過庭《書譜》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接著探討張瑞圖的書法應酬活動，考慮書家與書法在晚明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同時，配合張瑞圖書風的發展與筆法的變化，具體指出應酬活動如何對其書寫習慣產生影響，最後逐漸形成個人的特殊風格。

關鍵字：張瑞圖 應酬書法 孫過庭 書譜 晚明四家

前言

中國書法史中的應酬現象，雖已經學者鄭重提出^①，但迄今仍未受學界普遍重視。現存的古代書法作品中，應酬書蹟所佔的比例相當高，若忽視這些作品產生的脈絡，而一視同仁地進行分析研究，相信容易產生很多的誤解。由於應酬所涉及的層面極廣，對作品的呈現也會產生各式各樣的影響。然本文擬以張瑞圖的行草書風為例，具體說明應酬對書法風格所產生的影響。

明萬曆、天啟年間以後，書壇上便進入百花齊放的盛況，產生一批高水準的書家。其中又以個性派書家最受近代研究者的矚目，他們是十七世紀董其昌（1555-1636）之後最重要的書家。^②這批書家分別是張瑞圖、黃道周（1585-1646）、倪元璐（1593-1644）、王鐸（1592-1652）及傅山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編輯

① 作者此文受白謙慎討論應酬書法之啟發甚多，詳見〈傅山為陳謚作草書詩冊研究筆記〉，《故宮文物月刊》，1998年7月，第16卷第4期，頁74-83。〈從傅山和戴廷棧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999年夏、秋，第16卷第4期，頁95-135、第17卷第1期，頁137-156。

② 傅申，〈明末清初的帖學風尚〉，《明末清初書法展》（台北：何創時書法基金會，1996），頁9-25。

(1607-1684)，最年長的張瑞圖更為晚明四家「邢、張、米、董」中一員。^③除了張瑞圖以外，其餘三家皆恪守二王家法，屬於傳統帖學的風格。至於張瑞圖的獨特行草書風，究竟如何形成，確實令所有書法史學者感到莫名難解。儘管古今中外皆有不同的觀點被提出，卻都無法合理且信服地解釋其特殊性。^④實際上，書家個人風格形成的過程，除了內在因素的部分外，更牽涉到多樣且複雜的外來因素。因此，要解決張瑞圖書風來源的問題，除了重新討論那些令前人無功而返的書學淵源外，不得不回到他生活的社會脈絡中來找尋。

一、明末的社會環境

明代的官俸微薄，後人對此多有評論，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記》中專列一條：「明官俸最薄」^⑤，而《明史》中亦有「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⑥之說。官俸不僅是歷代最低，更是自始自終地貫徹實行，完全無視於社會經濟消費的提升。原先不豐的官祿，於洪武朝實施「折色俸」，將祿米改為米、麥、鈔三分，起初因鈔法初定，鈔值頗重，祿米折色並未引起太大的問題。之後亦略有更動，至成化年間，官俸折色改為米、銀、鈔，官不論大小，每月皆支米一石，一石米可供三口之家一個月。通過折色俸的分配，官俸被整體性地降低，高品官比原來低二百至四百石，中品官則低了三十五至一百五十石，而低品官與原俸略等。折色俸之物品時有更動，由於不符合實際的需求，加上變現不易與折價問題，因此不斷有官員提出強烈抗議。直至嘉靖、萬曆以後，白銀在社會上流通

③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288，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台北：鼎文書局，1994)，頁7396。另外，亦有「邢、張、董、米」之說法，見馬宗霍，《書林藻鑑》卷11，收入楊家駱主編，《近人書學論著》(台北：世界書局，1984)，下冊，頁284。

④較重要的專著有中田勇次郎，〈張瑞圖の書と詩〉，《中國書論集》(東京：二玄社，1970)，頁377-384。張光遠，〈明末書畫奇才張瑞圖的研究〉，《新亞學術集刊第四期》，1983年，頁311-327。劉恆，〈張瑞圖其人其書〉，《中國書法全集55》(北京：榮寶齋，1992)，頁1-19。賴文隆，〈晚明張瑞圖書法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美術組碩士論文，1995)。

⑤趙翼，〈明官俸最薄〉，《二十二史札記》(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32，頁473-474。

⑥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82，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台北：鼎文書局，1994)，頁2003。

越來越廣，且作用越來越穩定，才漸漸改成折銀制度。^⑦

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風尚隨之改變，奢侈之風逐漸形成，物價水準亦船高水長。當日常生活各方面都發生改變時，明朝官俸卻依然維持不變，致使高層官員的生活也捉襟見肘。以正一品每年六百石薪俸，折合成白銀三百來兩，還不夠一個富家子弟在繁華都市中生活三個月。下品官員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以正七品的知縣來說，月俸為米一石、銀二兩三、鈔三十貫，剛好勉強辦桌稍稍豐盛的酒席。^⑧

正統元年（1436），副都御史吳訥（1340-1455）上言：

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后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御史劉淮，由進士授官，月張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歸。^⑨

在社會奢靡風氣未趨極盛的正統年間，奉行廉潔的官員下場就已經是如此潦倒，尚須靠借貸過日。嘉靖、萬曆以後，官吏艱難的生活可想而知，^⑩若不貪贓枉法，^⑪高級官員單憑官俸僅可維持基本生活，低品官員根本就是窮途末路。

⑦陳關龍，〈明代文官的薪俸制度及其影響〉，《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5期（總第50期），頁95-98。王凱旋、李洪權，《明清生活掠影》（瀋陽市：瀋陽出版社，2002），頁65-67。鈔法與白銀的流通問題，請參閱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1972），頁364。Huang Ray,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69-81.

⑧王凱旋、李洪權，前引書，頁70-71。

⑨徐學聚，〈官俸〉，《國朝典彙》，卷35，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1996），史部政書類第265冊，頁145-146。

⑩海瑞是當時一個極端的例子，雖官至正二品，死時僅遺白銀二十兩，尚不夠殮葬。海瑞的討論，詳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38-168。

⑪關於明代官俸微薄與官吏貪污，其間因果關係的討論，參見王凱旋、李洪權，〈明代的官俸〉，前引書，64-75。陳關龍，〈明代文官的薪俸制度及其影響〉，前引書，頁98-100。謝蓬勃，〈“明官俸最薄” 謠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8月，第29卷第3期，頁73-78。蔡惠琴，〈明代中晚期（嘉靖—萬曆）士人科舉心態之探究—就《明代登科錄》的吏治觀論之〉，《輔仁歷史學報》，1998年6月，第9期，頁113-135。

明代官俸雖低，仍舊無法阻止士子對科舉的熱中，這反映出官員們還是有額外的收入，很多當然是經由非法的手段獲得。社會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與民逐利及貪污受賄，如此的狀況更為全民認同且接受，逐漸形成某種共識。一般民眾將這些非法的所得視為理所當然，那些廉潔官吏亦無法倖免於此觀點之外，所以當時所有的官員在百姓心中，都是難以與貧困聯想在一塊的。

中國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宗族制下，族中有能力考上進士，外出擔任官職的人回到故鄉，自然要肩負起全宗族的生計。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書》中提到，他在南京曾遭避難的親友包圍，期望能夠解決吃飯問題。^⑫著名的散文家歸有光（1507-1571）亦在信上向朋友訴苦，談及他無法離開昆山避難，否則必須帶者「百餘口」的族人同行。^⑬

與張瑞圖同為福建泉州人的李贄（1527-1602），也面臨同樣的困擾，考慮是否於退休（1580）後要扛起龐大宗族的生計。由於早在二、三十年前，李贄因父喪家居時，就有過這種痛苦的經歷。當時倭寇犯境，城中食物缺乏，族人生活陷入困境。雖然他只是低級的文官，卻不得不接受親族的擁戴，負擔起三十多人的生活。^⑭幾番考量後，李贄決定不回泉州，轉而削髮為僧，徹底擺脫來自宗族間的壓力。^⑮

這種來自中國傳統宗族制中特有的沈重，是所有文人在功成名就之後，皆必須面臨而無所遁逃的責任。除了宗族的部分外，當然不乏來自同儕間的壓力。生活在晚明的張瑞圖，自然無法置身事外，得面對現實地處理這些來自親朋好友的經濟問題。

二、張瑞圖的書法應酬

張瑞圖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北上赴職時，在給其姪信中，即已談及「官

⑫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1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子部雜家類第1125冊，頁592。轉引自黃仁宇，前引書，頁214。

⑬ 歸有光，〈與沈養吾書〉，《歸震川集》（台北：世界書局，1963），卷8，頁96。轉引自黃仁宇，前引書，頁214-215。

⑭ 李贄，〈雜述〉，《焚書》，收於《焚書 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3，頁84。

⑮ 關於中國宗族制度與官員之討論，與李贄的心境轉變。請詳閱黃仁宇，前引書，頁212-218。

因族夥少餘錢^{①⑥}」此社會現象。接著，泰昌元年（1620）除夕於家中寫下：

年來筆札訕資身，爆竹喧喧動四鄰。塵甑何曾緣米貴，苦吟聊可度王春。媿無
好語謝交謫，猶有窮親訴涸鱗。不是街東何禮部，能知此況更何人。^{①⑦}

儘管張瑞圖此時已成為親友的寄望，卻無法提供太多實質上的幫助。隔年，天啟元年（1621）十月又北上，至天啟二年抵京，^{①⑧}張瑞圖於此年前往拜會董其昌（1555-1636）。董云：「君書小楷甚佳，而人不知求，何也？」^{①⑨}透露出，連自恃甚高的董其昌都注意到張瑞圖於北京的應酬狀況，且對其應酬書體亦不陌生，更對其書法做出品評。無論當時引起董其昌關心的理由為何，相信新奇的書風與應酬數量應該都是重點。然而，若數量上僅為麟角鳳毛，表示大眾接受的程度不高，對晚明書壇並不會造成任何的衝擊，更不至於引起董其昌的興趣。因此，從董其昌的寶貴意見中，可知張瑞圖在北京的應酬活動應該已經相當活躍。

若配合張之渙所謂：「夫伯氏自通籍以來，謬負工書之名，又無客書之僻。凡兒童、走卒，求無不應。」^{②①}說明張瑞圖自中舉（萬曆三十一年，1603）後，^{②②}便以善書聞名，無論在泉州或是其他地區，都已經開始有人求書。從萬曆年間作品數量的稀少，到天啟年間作品大增看來，張瑞圖開始大量應酬的時期，約在天啟元年（1621）左右。^{②③}

為何張瑞圖的應酬量會突然增加呢？扣除部分真正求字的人後，張瑞圖那些

①⑥ 張瑞圖，〈駐三山寄壽因所姪時乙卯十月十二日〉，《白毫菴集》，外篇，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142冊，頁548。

①⑦ 張瑞圖，〈庚申除夕讀何稚孝先生歲盡詩用韻有作〉，前引書，雜篇卷2，頁616。

①⑧ 張瑞圖作品《感遼事作》題記：「天啟元年冬十月，芥子居士瑞圖書，將北行前之十日也。」收入《中國法書選52—張瑞圖集》（東京：二玄社，1990），頁35-36。另外從〈辛酉除夕用杜工部語起句在河間公署〉可知，瑞圖除夕已在河間，估計正月達北京，前引書，雜篇，頁584。

①⑨ 張瑞圖書《讀易詩二首》之款題，圖版見赤塚忠等著，于還素、戴蘭村譯，《書道全集》（台北：大陸書店，1989），冊13，頁24。

②① 張之渙，〈復某直指書稿〉，《汗漫吟》（明刊本，據內閣文庫影印），卷2。

②② 黃任等纂，〈明文苑〉，前引書，卷54，頁68。

②③ 筆者所收集的書法作品中，以紀年作品為例，萬曆時期約有30件，天啟時期約有190件。請參考何炎泉，〈張瑞圖之歷史形象與書蹟〉（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附錄1、2。

急需幫助的親友，顯然是促使其揮毫不倦的主因。張瑞圖故鄉雖遠在泉州，然而其副室賀氏是北京人，故北方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親族需要援手。此外，張瑞圖的〈都下送陳伯龍下第南還〉：

月黑鴈哀霜滿天，君來告我將南旋。長安久客囊羞澀，故國窮途路八千。俗眼人猶憎白壁，放歌汝已逼青蓮。送歸元是銷魂事，況復憐才倍黯然。^{②③}

更指出，京城內也有窮困的朋友，希望能從張瑞圖處獲得幫助。如此一來，從家鄉到北京，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擺脫這種壓力。張瑞圖也清楚，無論自己如何百般地解釋，都不可能獲得親友們的諒解，更無法置身事外。正是於此契機下，身負書名的張瑞圖與急需幫助的親友們便產生出某種默契，轉而以變賣張瑞圖書法來獲取生活所需。這種義行，林欲楫更是明文指出：

公早擅書名，蘸髮潑墨，奇恣如生龍動蛇，無點塵氣。請乞者，與不擇人，而以充貧交之米鹽者居半。^{②④}

對於當時有需求的求書者，張瑞圖並不吝嗇揮毫，他自己也清楚這些作品的用途，積極地想要助人解決困難。

這種以書法作品資助親友的行徑，正是代表張瑞圖這樣一位廉潔正直的官員，^{②⑤}如何在明末充斥著貪官污吏的大環境中，堅持理想所因應而生的抒困方式。類似的時空脈絡下，張瑞圖曾為其書寫生祠碑的李維楨（1547-1626），^{②⑥}所採取的則是另一種方式，以撰寫文章來幫助他人。^{②⑦}

②③ 張瑞圖，〈都下送陳伯龍下第南還〉，《白毫菴集》，外篇，前引書，頁548。

②④ 林欲楫，〈張瑞圖暨王夫人墓誌銘〉，文收於賴文隆，前引文，頁533。

②⑤ 關於張瑞圖人品的詳細討論，請參考何炎泉，前引文，頁5-48。

②⑥ 張瑞圖，《小楷李先生祠記》，收錄於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1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72-73。

②⑦ 「維楨為人，樂易闊達，賓客雜進。其文章，弘肆有才氣，海內請求者無虛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為請乞，亦應之無倦，負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新校本明史》，卷288，頁7386。

三、風格來源與轉變

要釐清張瑞圖書風的轉變過程，必須將早期書風來源及某些重要筆法加以處理，才能掌握到其風格變化前後之異同。

（一）行草之書學淵源

張瑞圖於萬曆時期之書法作品已是成熟的書風（圖1），隸屬於傳統的二王帖學體系。作品中除二王書風外，尚可明顯感覺到與懷素《小草千字文》（圖2）中圓轉筆法的深厚關係。此外，從結字及用筆的角度來看，吳派書家的影響亦不可忽視，其中以祝允明（圖3）及文彭（圖4）的風格較為明顯。

無論影響張瑞圖的有哪些帖，都避不開帖學系統中最重要的《淳化閣帖》。福建自宋代開始，便一直是全國出版量最大的地區，泉州在出版地位雖不及建陽及福州，但仍然是重要刻書中心。^{②⑧}不難想像，在出版業如此發達的地區，《淳化閣帖》的翻刻應該是相當頻繁的。例如，南宋刊刻的《泉州本淳化閣帖》（亦稱《泉州帖》、《泉帖》），在泉州翻刻數量即高達十數種，有《泉州府學淳化閣帖》、《泉州帖馬蹄石本帖》、《張峒齋增刻馬蹄本》、《蔡沙塘增刻馬蹄本》、《棗木板淳化閣帖》、《沈氏補摹棗木本》、《李氏補摹棗木本》、《廖瑩中刻本淳化閣帖》、《漁人網得棗木本》、《晉江石本閣帖》諸刻。^{②⑨}由於《淳化閣帖》的複雜性，加上缺乏相關資料，故不易得知張瑞圖所見到的版本為何。^{③⑩}

②⑧ 謝水順、李琨，《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②⑨ 陳繁仁，《閩中金石略》（福建省圖書館藏清抄本）。

③⑩ 劉恆先前主張：張瑞圖年輕時的習帖，乃是明代於泉州翻刻《淳化閣帖》的《泉州帖》

。賴文隆在碩士論文中，亦採用劉恆之說，認定張瑞圖早年學習《泉州帖》。不過，劉恆後來改變原先看法，認同《泉州帖》乃是南宋翻刻的意見，亦不提及張瑞圖曾經學習過此帖。劉恆，〈張瑞圖其人其書〉，《中國書法全集55》（北京：榮寶齋，1992），頁13。賴文隆，前引文，頁101-102。劉恆，《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356-359、452。關於《泉州帖》之討論，詳見《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62，頁64。周亮工，《閩小記》，收於《龍威秘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冊10，頁27。楊賓，《大瓢偶筆》，卷6，收於《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8，頁773。蔣文光，〈宋拓泉州本《淳化閣帖》考〉，《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考識辨異篇》（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頁539-545。

此外，由於張瑞圖幼年家境並不富裕，連一般科舉用書都需要親自抄寫，^{③①}故張瑞圖根本不可能有多餘的錢，能夠購買整套的《淳化閣帖》。當時印譜類的書價，就已經高出一般書籍甚多，因為製作時必須手工鈐印，屬於比較複雜的工序。^{③②}而製作法帖的性質則相當接近印譜，基本工序類似，且捶拓過程並不比製作印譜省事，故價格也不可能便宜。礙於經濟狀況，張瑞圖個人於早年確實不容易擁有整套的《淳化閣帖》。當然，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張瑞圖還是有學習過《淳化閣帖》的可能性，只是當時的狀況已難推知。

除了《淳化閣帖》外，若考慮張瑞圖早期書風的作品中，同時有祝允明與懷素《小草千字文》的風格，及稍後會論及的孫過庭《書譜》與文徵明小楷筆法，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指向嘉靖年間刊刻的《停雲館帖》。該帖卷三摹刻孫過庭的《書譜》，卷四有懷素《小草千字文》，而卷十一則收錄祝允明書作四件，卷十二有文徵明小楷《黃庭經》。^{③③}配合當時蘇州品味風行全國的狀況來看，張瑞圖早年的書法學習或許與《停雲館帖》有密切關係。

至於五十歲以後，張瑞圖究竟受了那些影響，才逐漸形成獨特書風，則是本文要處理的重心。首先看看在過去書法著作中，書論家是如何討論張瑞圖的奇特書風。明末姜紹書在時代上較接近張瑞圖，^{③④}於《無聲詩史》中提及其書法：

書法奇逸，於鍾、王外闢一蹊徑，亦顛、素之雲仍也。^{③⑤}

認為其行草並非傳統的鍾、王系統，而是另闢蹊徑，乃傳張旭及懷素之衣鉢。顯示作者無法在傳統的書學體系中，為張瑞圖找到適當的位置，只好將其視為狂草書家之後裔。在明末，張瑞圖這種奇逸的行草，顯然不被視為傳統的書風，而被歸為另類書法。

③① 何炎泉，前引文，頁5。

③②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年6月，第1期，頁101-118。

③③ 容庚，《叢帖目》（台北：華正書局，1984），卷3，頁221-229。

③④ 姜邵書，字二酉，號晏如居士，江蘇丹陽人。崇禎年間官南京工部郎。詳見陳傳席，〈無聲詩史〉，收入蔣孔陽、高若海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藝術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778-781。

③⑤ 姜紹書，〈張瑞圖〉，《無聲詩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冊4，頁857。

入清後，梁巘（1710-約1785後）的意見：

張瑞圖書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瑞圖行書初學孫過庭《書譜》，後學東坡草書《醉翁亭》。^{③6}

孫過庭《草書千字文》，結體方扁，一意適厚，與世傳《書譜》信筆所之，如不作意者迥別。二水殆襲其體而少加險縱耳。^{③7}

前段用了肯定的語氣，容易使人誤以為梁巘手中握有具體證據，故能直接指出張瑞圖之書學淵源。然而，後段卻又推測張瑞圖大概是學孫過庭《草書千字文》，信心上略顯搖擺。且梁巘自己亦承認，《書譜》與《草書千字文》根本分屬兩種不同的風格，卻又同時視為張瑞圖書風之源頭，其中不免產生矛盾。因此，梁巘這兩段言論應該都是出於推測，而非有直接的證據。

基本上，像梁巘如此具有豐富的學識，且一輩子致力於書法實踐與研究的學者，都無法精確地判斷出張瑞圖的書風來源，可見要解決此問題，確實有著實際上的困難。不過，試著從張瑞圖自身的言論出發，配合前人的意見，重新思考整理，或許可以得到不同的觀點。張瑞圖在《後赤壁賦》（天啟乙丑，1625）中題：

孫過庭論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此草書三昧也！旭、素一派流傳，此意遂絕。余於草書，亦少知使轉而已，情性終不近也！^{③8}

此語出自《書譜》，足見張瑞圖對孫過庭之推崇，至於張旭及懷素，他則不表贊同。折服孫過庭理論的張瑞圖，書法上自然也可能受到孫過庭的影響。

梁巘所提到的作品中，除了《書譜》可以確定外，其餘兩本都無法知道究竟指的是哪一件。加上流傳的幾本孫過庭《草書千字文》與蘇軾《醉翁亭記》，風格上似乎都與張瑞圖的行草關係不大。^{③9}因此，在不穩固的基礎上強行分析根本無濟於事，只會讓張瑞圖書風的來源產生更多的困惑。

因此，將重心置於《書譜》上，似乎是較為實際的方式。只要比較過《書

^{③6} 梁巘，《評書帖》，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10，頁537。

^{③7} 梁巘，《承晉齋積聞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10，頁528。

^{③8} 張瑞圖，〈後赤壁賦〉，《果亭翰墨》，卷2。

^{③9} 詳細討論見賴文隆，前引文，頁102-103。

譜》與張瑞圖作品後，即很容易發現關連性不大，因此幾乎沒有學者願意認真考慮兩者的關係。事實上，張瑞圖引錄孫過庭理論的時間為天啟五年（1625），也就是離開傳統書風數年後，其個人風格已趨成熟之時。然而，張瑞圖卻認為自己的作品距離《書譜》中的理想標準仍有相當的差距，僅能達到一半而已。所以，在張瑞圖書風發展的過程中，孫過庭無疑是其理論上的最高指導，故確實有必要重新檢討《書譜》對張瑞圖書風的影響。

由於張瑞圖書風在發生改變之時，其本身的傳統書學已有相當功底，因此在汲取新養分的方式上，應該屬於啟發式的吸收，而不會拘泥於點劃形式。除卻書論觀念的部分外，張瑞圖在書法上究竟會受到《書譜》何種形式的啟發呢？

重新檢視張瑞圖獨特書風的作品，發現有部分用筆的概念確實源自於《書譜》中的「節筆」（圖5），^{④①}此筆法在張瑞圖不斷地演練下，才日趨形成特殊的書寫習慣。「節筆」是孫過庭《書譜》墨蹟中，相當特別的一種筆法，並不為傳統書論家所重視。這種筆劃出現的原因，乃是因為筆毫在運行過程中，碰觸到摺紙所產生的凸痕，而產生無預期的跳動所造成。

歷代書家在臨習《書譜》時，並沒有人特別將此一筆法摘出，演練發展成自己特有的筆法。^{④②}或許，過去書家皆將此視為書寫上的常態，僅是一般的現象，並不值得特別關注。對於孫過庭本身而言，此「節筆」的筆法也並非刻意書寫出來，完全是出於巧合的狀況。

這種「節筆」也不只在《書譜》中出現，只要狀況條件符合，自然就會產生。現存古法帖中，還保存為數不少的例子，如王羲之《喪亂帖》（圖6）、《二謝帖》（圖7）、《得示帖》（圖8）、顏真卿《寄姪文稿》（圖9）等。^{④③}


因此，將孫過庭《書譜》中「節筆」的部分檢出，與張瑞圖作品中運用此筆法的部分一起列出（表1）。表中所用張瑞圖作品為《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天啟元年冬十月，1621）與《草書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天啟七年春，1627），一是剛剛開始採用此筆法時的作品，一是將此筆法成熟應用之作。

④① 鍾氏豐，〈「書譜」節筆及古法帖折紙方法之探索〉，《故宮文物》，1992年10月，第10卷第7期（總第115期），頁24-45。

④② 鍾氏豐認為米芾於《海岳名言》中的「折紙書」，即為學習孫過庭「節筆」筆觸，然從米芾現存墨蹟中，並未發現此一筆法之使用。見〈「書譜」節筆及古法帖折紙方法之探索〉，前引書，頁40-41。



④③ 鍾氏豐，〈「書譜」節筆及古法帖折紙方法之探索〉，前引書，頁28-29。

表1 孫過庭與張瑞圖節筆筆法一覽表

<p>孫過庭 《書譜》（停雲館帖）</p>	<p>張瑞圖 《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p>	<p>張瑞圖 《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p>
		
		
		
		

<p>孫過庭 《書譜》（停雲館帖）</p>	<p>張瑞圖 《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p>	<p>張瑞圖 《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p>
   	   	   

<p>孫過庭 《書譜》（停雲館帖）</p>	<p>張瑞圖 《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p>	<p>張瑞圖 《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p>
   	 	   

孫過庭 《書譜》（停雲館帖）	張瑞圖 《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	張瑞圖 《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
		

天啟元年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張瑞圖在平坦的書寫面上，為了產生「節筆」的效果，在特定位置都刻意改變用筆的力量及方向。由於屬於剛開始試驗的階段，因此這些筆劃都呈現出刻意且稍微造作之痕跡。隨著不斷地演練，張瑞圖漸漸擺脫外型上的模仿，至天啟七年的書作時，已經完全演化成獨具個人魅力的筆法，成功地將此筆法化為己用。更特別的是，原先僅能在左撇筆的部分，也就是由右至左的筆順上，做出模擬「節筆」的動作，至天啟七年時，已經能夠左右開弓，連由左至右的草法捺筆 ㄣ，都能自由地做出「節筆」的動作，完全展現出對此筆法的操控力。

張瑞圖能從《書譜》這樣一件屬於王字系統的書蹟中，以創造性的眼光來吸收「節筆」筆法，確實有其獨到之處。他在談論晉人小楷時提到：

坡公有言：「吾雖不善書，知書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假我數年，撇棄舊學，從不學處學之，或小有近焉耳。^{④3}


正是因為張瑞圖有這種不泥於傳統的觀點，使得他在面對非傳統書學所能欣賞的「節筆」時，能加以吸收且發展出富有個性的獨特筆法。

張瑞圖書法還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呈現 ㄣ 型態的橫劃，另一為方折的用筆，這在一般行草作品中都不常見，是接下來要處理的重點。


^{④3} 張瑞圖，〈詩評〉，《果亭翰墨》，卷1。

（二）應酬書風之形成


將紀年作品按年代排序，可清楚看出張瑞圖如何在大量的書寫應酬中，逐漸產生出獨特的行草書風。

天啟元年書作《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圖10）中，已經出現《書譜》中節筆的筆法，可知張瑞圖在此時已經受到孫過庭此一筆法的啟發。作品中的橫劃也已經出現向上彎曲的特色，猶如  的形狀。

張瑞圖在書寫小楷的橫劃時，其起筆多以筆尖下筆，往右行筆過程中，漸漸加重按筆的動作，並沒有清楚的起筆轉折（圖11）。如此的動作，在鍾繇的《賀捷表》（圖12）中可以看到。此外，這種尖細而不帶轉折的筆法，亦出現在吳派大家文徵明的小楷作品中（圖13）。

通常書寫較大的作品時，下筆無論迴鋒與否，皆會在起筆動作完成後將筆鋒轉正，張瑞圖於萬曆間的作品就屬於此種筆法（圖1）。然而張瑞圖於天啟年間書寫橫劃時，直接使用筆尖下筆，並未在起筆後作出明顯的轉鋒動作，而是將此一連串的书寫動作擴大至整個橫劃的前半部，導致產生  型態的橫劃。故張瑞圖此特殊橫劃的出現，與其小楷橫劃的書寫習慣有密切關係。

為何在萬曆年間，對傳統書寫筆法並不陌生的張瑞圖，到了天啟年間，開始轉變成另一種筆法？要解決此疑問，則必須考慮應酬的數量。

萬曆年間張瑞圖的應酬量較少，因此在書寫時，可從容不迫地發揮舊學，以傳統的書寫技巧仔細地操作著。當應酬量漸漸增多時，原先的從容開始變得身不由己，甚至還可能帶著些許的無奈。這種情況下，書家容易產生厭倦疲憊的心態，進而可能導致草率了事的狀況。況且張瑞圖自己亦明白，這些作品不過就是充當親友的生活費而已，不需要也不容許花費太多時間去琢磨經營。^④因此，在完成大量書法應酬的過程中，張瑞圖也逐漸衍生出一套新的書寫慣性。首先出現的是，他最熟悉的小楷筆法漸漸顯露於行草作品中，逐漸形成帶有  型態的橫劃。

由於張瑞圖橫劃的角度並非水平，而是呈現上仰的姿態，若堅持配上圓轉的筆法，則折肩迴旋的角度會遠遠超過水平橫劃的角度，增加書寫的困難。圓弧線條於書寫時要略慢於直線的行進速度，以待鋪於紙面的筆毫能反應過來，方能確保行筆的中鋒，對書家而言需要比較多的注意力，並不利於大量書寫。事實上，

④ 在張瑞圖書法應酬量最大的天啟年間，應酬主要形制的立軸作品確實出現良莠不齊的狀況，而手卷、冊頁則表現出相反的狀況。待瑞圖涉入逆案後，立軸作品往往書寫的比較用心且水準較齊。

張瑞圖於作品中有意識地持續增加折筆的使用，更證實他確實從實際應酬過程中找出取代圓轉折肩的方案，以謀求最大的經濟效益。

折筆的增加除了考慮書寫的便利性外，同時也牽涉到張瑞圖與觀眾之間的審美取向。由於應酬數量導致橫劃出現「ㄣ」的型態，品質上缺乏肯定的俐落感，這種起筆動作不確實的橫劃若再搭配圓轉的筆法，相當容易流於纖弱無力。然而，尖銳的橫劃若配合折筆的使用，卻反而形成一個偏鋒與折筆的融洽體系。起筆及轉折處的尖端在視覺上形成強烈之刺激感，而方折的筆法更導致單字外觀出現帶角的幾何外型，無論是線條的銳利感或幾何的強烈構築性（圖14），都大大改善原先因大量書寫所產生的缺陷。天啟前期作品中雖然總是存在著兩組相異的審美系統，但風格變化的最終，顯然是方折筆法完全地取代圓轉。這種特殊書風可視為書家與觀眾之間，慢慢地互動協調所發展出來的成果。

隨著張瑞圖官位的不斷攀升，四方親友肯定陸續風聞而至，因此這種應酬只會有增而無減。天啟五年除夕，張瑞圖寫下：

屏跡雖吾拙，向人理亦難。一囊當歲晏，百口仰儒冠。裘馬慙相炫，窮愁久自寬。梅花隔塢好，過雨且需看。^{④5}

要想養活這「百口」的人，當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由於張瑞圖原本在此次回鄉時，已經萌生歸隱的打算，^{④6}準備連原來微薄的官俸都捨棄掉。因此，天啟四年（1624）到六年（1626）的這段回鄉期間，張瑞圖的應酬量應該是顛峰期，必須完全以書法來負擔起這些貧困親友的生計。然而，在朝中友人不斷的勸說下，^{④7}及來自親友們的壓力下，張瑞圖還是在天啟六年決定北上，進入當時險惡的政治圈中。

④5 張瑞圖，〈乙丑除夕〉，前引書，雜篇卷2，頁606。

④6 關於張瑞圖萌生歸隱念頭一事，請參考何炎泉，前引文，頁9-10。

④7 「庾嶺梅花綻曉煙，懷人徒倚睨張顛。千頭舊緒憑誰寄，數首新詩付雁傳。漫向東山問卜筮，書言構果我亭不入都門，遙從台斗望星躔。時危正急需霖雨，莫愛臨池醉墨研。」傅振商，〈虔臺得張二水宮侍書及字簞〉，《愛鼎堂全集選》（台大圖書館藏清刊本），卷7，頁17-18。張瑞圖，〈丁太常過訪山中以北上之期見訊〉、〈丁太常頗為余決策北上賦此答之〉，前引書，頁618。詩作時間之推斷，請參考劉恆〈張瑞圖其人其書〉之註釋8，前引書，頁17。

北上舟中所書的《行草杜甫驄馬行詩卷》（天啟六年，1626）題：

天啟丙寅，北上芋原舟中，從里中追隨督書，逋者未許解纜，書此時漏下四鼓矣，果亭山人瑞圖。^{④8}

求字人是從「里中」追隨而來，而且令張瑞圖一直書寫至四鼓（凌晨1點-3點）才罷休。如果只是單純的求字，相信不會如此緊張與急迫，且張瑞圖回鄉也兩年多，何以要待到北上的最後一天，才苦苦追隨索書。以張瑞圖天啟六年的成熟書風，若從白天上船開始寫，到漏下四鼓才休息，可以預見其書寫量會有多少。換句話說，這種不眠不休的書寫方式就如同經濟商品的生產，數量才是求書人關心的問題，品質只要在容許的範圍內即可。因此，這些人絕非張瑞圖的「書迷」，顯然是那些需要幫助的親朋好友們。畢竟張瑞圖此行不知何時才能返鄉，故親友們紛紛把握機會，要張瑞圖多寫些作品，以備不時之需。

另外一件書於天啟七年（1627）的《行書西園雅集卷》，卷後有其子張潛夫的跋：

此先人政府時筆也。當年侵星入直上漏方出，則乞字人爭磨隄廩以待矣，先人次第揮與，非午夜不得休，日以爲常，今四十年矣！焚香展玩，髣髴猶瞻神采也，丙午（1666）冬鏡湖逸史張潛夫敬識。^{④9}

談到張瑞圖北上以後，在京城의 忙碌應酬狀況。身為大學士的張瑞圖，每天忙完政事後，還要一直揮毫至半夜才能休息。這種誇張的狀況，當然也不是一般的索書應酬，隱約地暗示出一種半強迫性質且帶著些許無奈卻又無法逃避的責任感。

從這兩件作品的題跋看來，張瑞圖書寫應酬的量確實相當大，而且在天啟後期達到最高峰。這些應酬書作中，當然不會完全都是資助親友，應該還是會有少量正常的應酬在內。迫於無奈之下所衍生出的資助方式，對張瑞圖本身而言，是處於相對被動的位置。這類的作品帶著強烈的功能性，對書家與求字者的意義略有不同，書家只是盡力達成使命，而獲字者則要考慮到市場的問題。如此一來，作品的表現形式，有相當的決定權在求字人身上，因為在市場上實際操作的人是他們，唯有他們才比較清楚書法作品要以何種面貌進入市場機制中。面對此類大

^{④8} 該作收錄於廣津雲仙，《張瑞圖の書法・卷子篇（二）》（東京：二玄社，1981），頁8-29。

^{④9} 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262。

量的應酬時，張瑞圖能做的就是，將作品維持在某種可以被接受的品質，以最經濟的方式書寫出來，好解決親友們的困難。

張瑞圖的書法就在這種大量應酬的脈絡下，逐步發展出一種合宜的書寫方式，在品質上可以被大眾所接受，又能達到大量生產的要求，其典型為天啟後期的書風（圖14）：直接起筆快速地書寫，而不需考慮筆鋒之角度問題，所有圓轉皆以簡單便利的折筆代替。

四、特殊風格之意義

由於這種書風演變的動力，可以說有相當的部分來自於親友間的壓力，因此對於最後完成的風格，張瑞圖顯然並不是非常滿意，這在他的《後赤壁賦》（天啟五年，1625）題識中可清楚見到。^{⑤①}天啟五年，正好是張瑞圖應酬的高峰期。寫出此番言論，亦可說明他相當清楚自己的問題所在。

在這個特殊書風的發展趨勢中，當然也存在著張瑞圖個人對書法審美的期望，只是當時的環境因素並不能如願地配合。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交替影響下，張瑞圖才得以在當時二王傳統書風盛行的環境中，書寫出這種相當獨特的書法風格。其中雖然有很多被動的因素，然而張瑞圖依然是主要的操控者，正賴於他那種勇於探索且不拘俗觀的特質，^{⑤②}才使這個在當時不可能出現的書風能夠一步步地完成。

李蛟禎〈張二水草書歌〉：

顛旭狂素渺千載，蓬振沙驚奇蹟改。秋蛇春蚓競墨池，移山蹴海力何在。先生突出石渠中，手指蠕蠕騰異采。崑刀截玉俟筆鋒，腕中神鬼不可解。欸若陡崖瀑布奔，蚪角鯨背聳嶙峋。健鶻搏擊聲格磔，風毛雨血天日昏。虹蜺蛟螭鬥倔強，風雲擺捩生氤氲。鴉兵鷁軍鐵騎出，勢險節短難與倫。我從西市微賞得，邸中三百浮太白。拍案叫賞里巷驚，但見蛟龍攫几席。擔夫爭道開悟門，此法

^{⑤①}詳見前引文，同註38。

^{⑤②}「古之用人，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雖甚不肖，皆有以自致。於實，堯舜未嘗標君子之名，而置禹稷於岳牧之上，未嘗設小人之名，而輕用四凶之討。分別起於仲尼……小人亦有可大受者，君子亦有并小知而屈者。」張瑞圖這種不為傳統拘束的個性，在此會試策論中展現無疑。文引自不著撰人，《五十輔臣考》（台北：中央圖書館舊抄本），卷1，頁8。

不自山陰關。真似觀濤向廣陵，醒釀病酒態俱失。世人雙眼殊模糊，夸逸競媚互吹噓。譬如群姬工障袂，妖蠱羸弱無眉須。手中詎有康回力，觸折不周怒氣據。請質鐵腕王太史，未審首肯此評無。^{⑤2}

其中「我從西市微貲得」這句，透露出張瑞圖書法的價格並不昂貴，且流通之處為一般的市集，性質上屬於一般的書畫商品。董其昌更是以他對書法藝術獨特的敏感度，對張瑞圖的書法做出評語，獨許其小楷而不及行草。在董其昌觀念中，書學傳統是不容忽視的，故其言論中亦間接指出，這些喜愛張瑞圖行草的普通百姓並沒有什麼鑑賞能力。類似的意見在梁獻的評論中亦可見到：

張瑞圖書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

只要從傳統書學的角度出發，就很難將張瑞圖行草書法與古典聯想在一起，所以梁獻才會用「其品不貴」來形容。其實，他們除了指出張瑞圖書法中背離傳統的特性外，更是暗示其書中所具有的大眾特質。

這種特質，除了關係到書作的市場性外，更導致張瑞圖牽連魏忠賢逆案。魏闖事敗自縊後，朝中流言四起，紛紛指謫張瑞圖曾親書生祠碑文，加上思宗又親睹張瑞圖所書的金字賀屏，於是便無端涉案，莫名其妙成為書寫生祠碑、額之人。歸結真正原因，還是在於魏忠賢喜愛張瑞圖書法的這個環節上。^{⑤3}但令人玩味的是，魏忠賢根本目不識丁，^{⑤4}何以能欣賞中國藝術中需要具備較多能力才能進行審美的書法呢！

張瑞圖書法的愛好者在接觸到其書作時，基本上不需具備太多傳統書學的修養，便能夠獲得豐富的審美經驗。因為張瑞圖除了發展出一套異於傳統的筆法外，更將運筆的節奏變化發展成容易感知的視覺韻律，完全將書法欣賞的門檻降至最低，形成一種獨特而強烈的視覺性書法。這種偏向純粹視覺感受的審美，只要具有功能上相同的眼睛，無論任何文化階層皆能獲得。正因如此的特質，才會使得歷代評論家在接觸到張瑞圖書法時，幾乎一籌莫展，傳統的書學品評根本無法派上用場，僅能以「自闢蹊徑」之類的話語來含糊帶過。張瑞圖書法中這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力與容易欣賞的優點，使其書作帶有某種親近大眾的通俗性。當

⑤2 李蛟禎，〈張二水草書歌〉，《增城集》（明崇禎刊本，據尊經閣文庫影印），卷5，頁9-10。

⑤3 關於張瑞圖為魏忠賢書生祠碑一事之考辨，詳見何炎泉，前引書，頁21-45。

⑤4 《新校本明史》，卷305，頁7816。

然，這種特質更是確保其市場上的經濟價值，故也可視為張瑞圖書作中的賣點。

五、晚期對書風之修正

天啟七年（1634）春的《草書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圖15）中，可以感受到張瑞圖開始在完全方折的作品中，加入適度的圓轉筆劃。這或許代表他對應酬書風不滿的狀況下，重新調整書寫態度後所產生的變化。隨後書寫的作品中，皆以平和淡雅的氣氛來代替強烈的張力感，這從致仕返鄉舟上所書的《行書韓愈山石詩軸》（圖16）中可清楚地感受到。

崇禎二年（1629）三月，張瑞圖因其書法深受魏忠賢喜愛而涉入逆案，作贖為民。^{⑤⑤}此時書法作品數量驟降，而繪畫作品數上升，^{⑤⑥}或許張瑞圖在削籍為民後，更有理由可以拒絕大量的書法應酬。當然，張瑞圖返鄉後馬上投入其母親的喪事，可能也是部分的原因。

牽連逆案對張瑞圖打擊很大，至於其心理狀態是否影響到書法的書寫，則很難判斷。唯一清楚的是，書法應酬數量相對減少，使得張瑞圖有更多的時間作畫。因此，遭逢巨厄後的張瑞圖，擔任心靈寄託的藝事應該是繪畫，而不是書法。書法應酬量的變化，勢必牽動著張瑞圖的書風。此時期大量出現需要花時間的小楷作品及行楷立軸，而行草作品亦以行楷筆意為主，一筆一劃地仔細書寫（圖17）。至於轉折部分，則多以圓轉居多，取代先前完全方折的寫法。

這種以行楷筆法來書寫的奇特草書，究竟在張瑞圖心中代表何種意味呢？若回到他在天啟五年（1625）《後赤壁賦》所發表的意見，^{⑤⑦}可知天啟年間的應酬書風，是完全無關於他個人的情性。或許張瑞圖這種將楷書筆法中的點劃，完全運用於行草作品中的書寫，就是他心中所理解的「點畫為情性」。不論答案為何，都必須承認，在晚年的書風發展中，張瑞圖個人是扮演最重要的舵手。將這種狀況與天啟年間應酬的窘況相比，當然崇禎年間的作品是比較符合張瑞圖的「情性」。

⑤⑤ 《新校本明史》，卷306，頁7847。

⑤⑥ 請參考何炎泉，前引文，附錄1、2。

⑤⑦ 詳見前引文，同註38。

結論

張瑞圖的特殊行草並沒有明顯的風格來源，主要是在書家及眾人的期望下逐漸完成，可以視為晚明社會中，文人與大眾階層的調和產物。如此的風格所提供的訊息，絕不僅止於書法風格史本身，對當時共同催生此書風的參與者而言，分別產生不同的意義脈絡。對張瑞圖而言，個人書學理想與應酬任務相互衝擊抵觸，而索書者則負責書作進入市場機制的運作問題，購字者則從書家身份、藝術性與價格等實際考量來面對作品。利用對應酬活動本身的考察，則可以將這些分屬當時社會上的不同面向關聯起來，使得張瑞圖的書法於晚明社會中的意義更加清晰。

稍晚的傅山也存在著書法應酬的問題，可以用來解釋其書蹟中較狂怪粗野的風格。^{⑤8}由於張、傅二人恰好分屬明末清初的個性書家中之首尾，無論從個人實例或是時間上，都突顯出應酬在此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當然，不獨明末清初如此，在整個書法史的漫長過程中，應酬必然是持續不斷地發生著，且扮演著相當活躍的角色，只是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責任編輯：盧宣妃）

⑤8 白謙慎，前引文，同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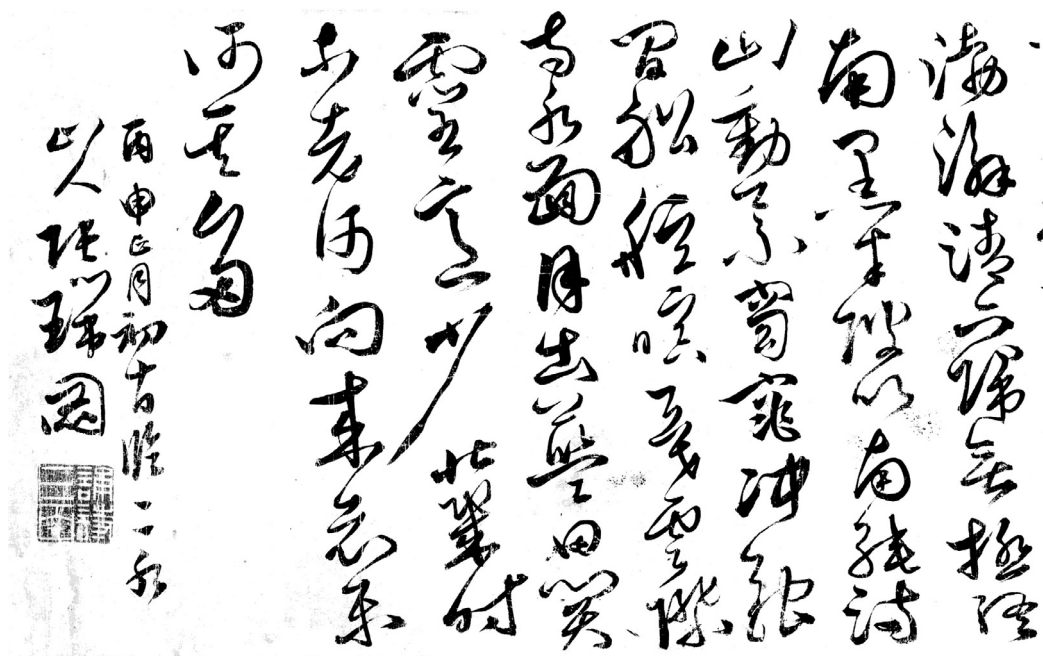


圖1 張瑞圖 《草書杜甫漢陽行詩卷》 1596年 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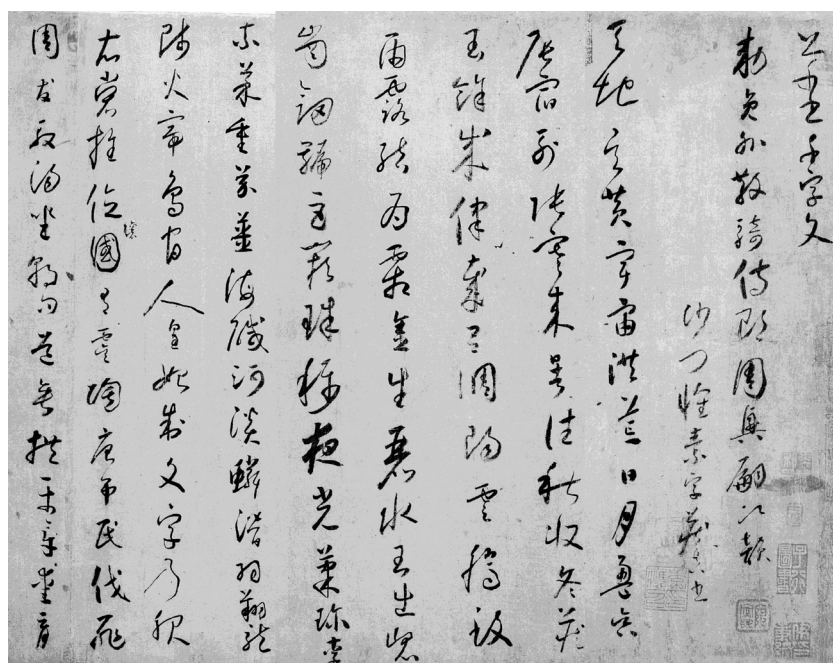


圖2 懷素 《小草千字文》 799年 台北蘭千山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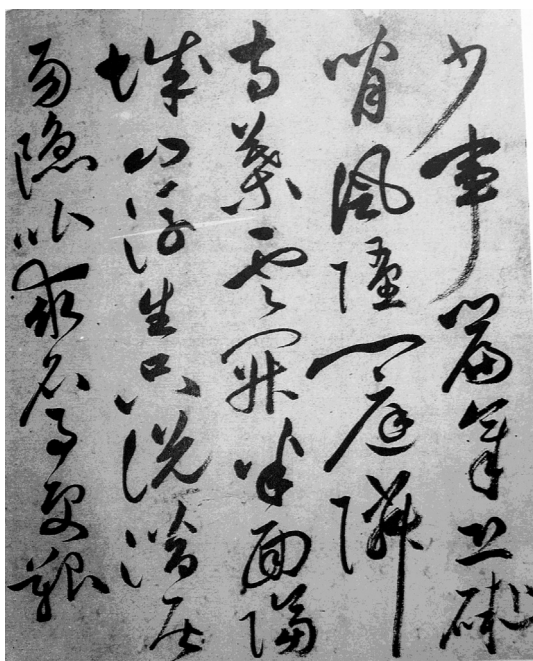


圖3 祝允明 《閒居秋日等詩卷》 1510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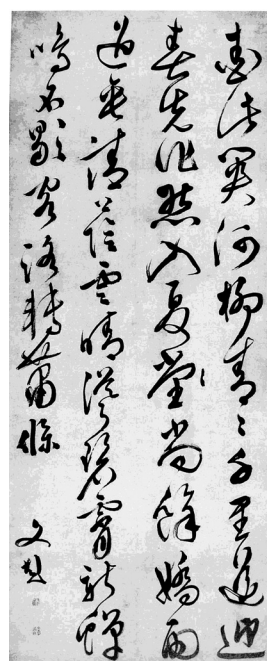


圖4 文彭 《愛此關河柳草書軸》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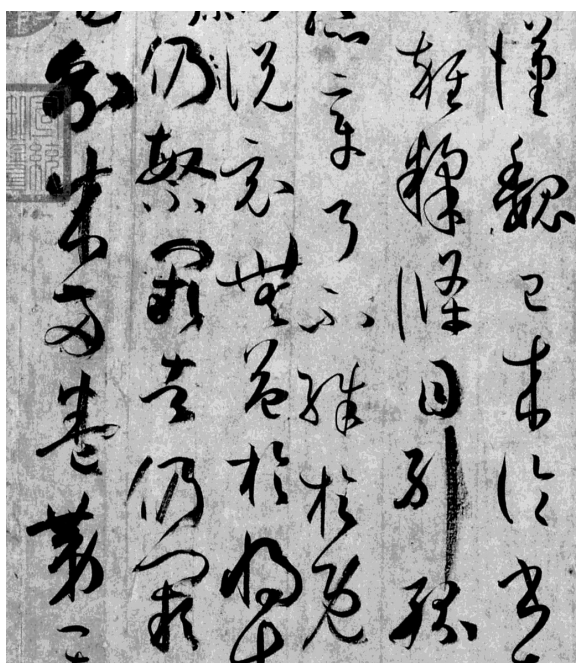


圖5 孫過庭 《書譜》 687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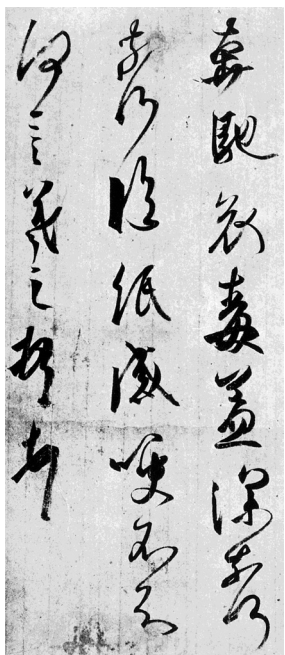


圖6

圖6 王羲之《喪亂帖》 日本皇室藏



圖7

圖7 王羲之《二謝帖》 日本皇室藏



圖8

圖8 王羲之《得示帖》 日本皇室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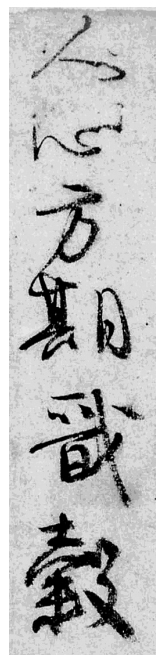


圖9

圖9 顏真卿《寄姪文稿》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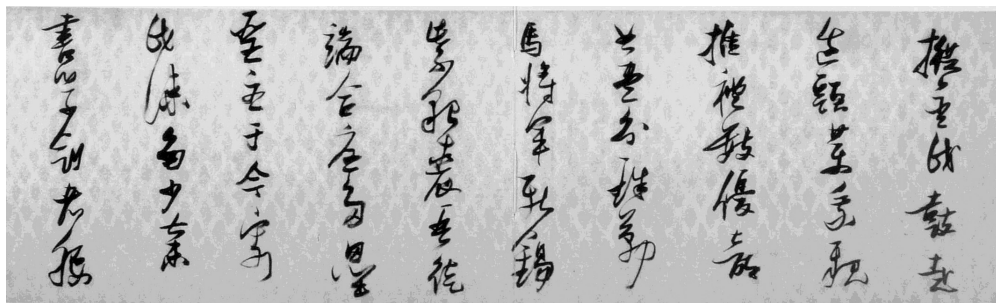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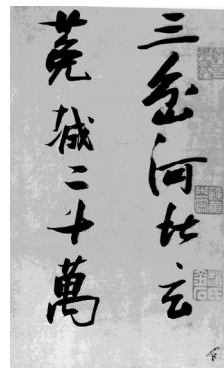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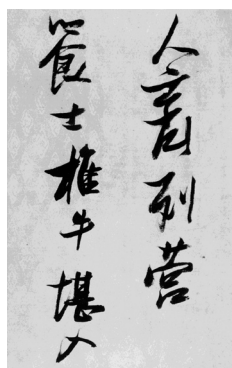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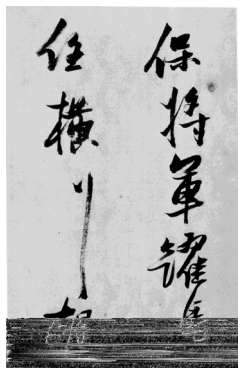


圖10 張瑞圖《行草自作感遼事作詩卷》 1621年 橋本末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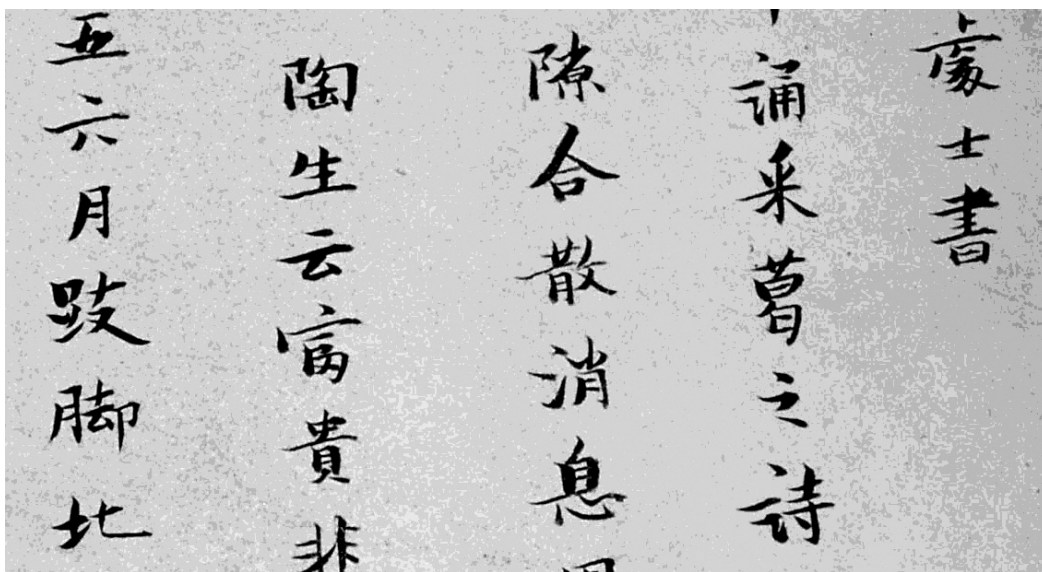


圖11 張瑞圖 《小楷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畫冊》 1633年 藏地不明



圖12 鍾繇 《賀捷表》(鬱岡齋帖) 219年 書道博物館藏



圖13 文徵明 《臨羲之黃庭經》（停雲館帖） 1532年 首都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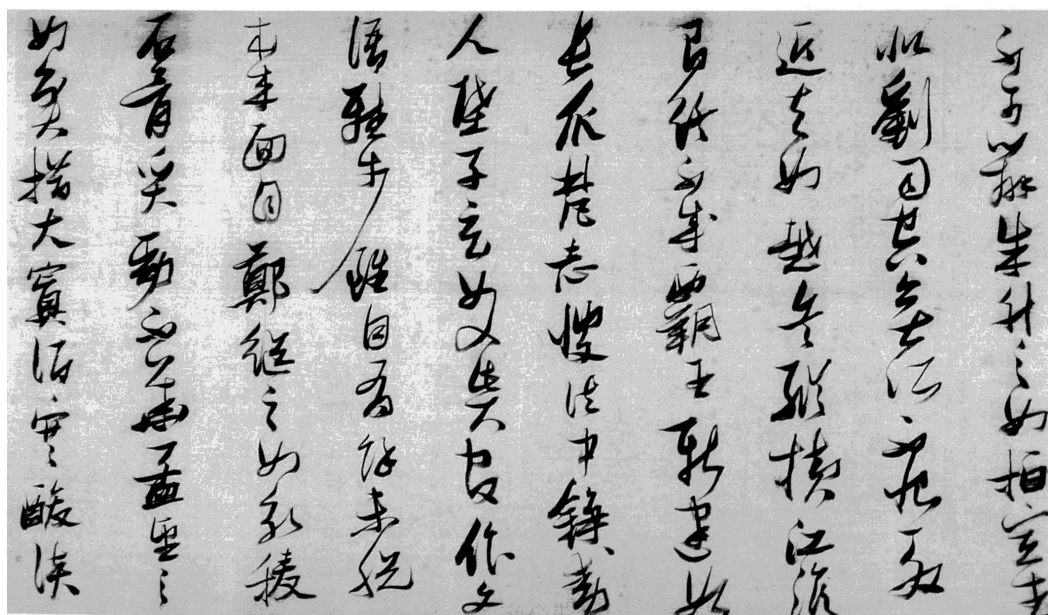


圖14 張瑞圖 《行草王世貞國朝詩評卷》 1624年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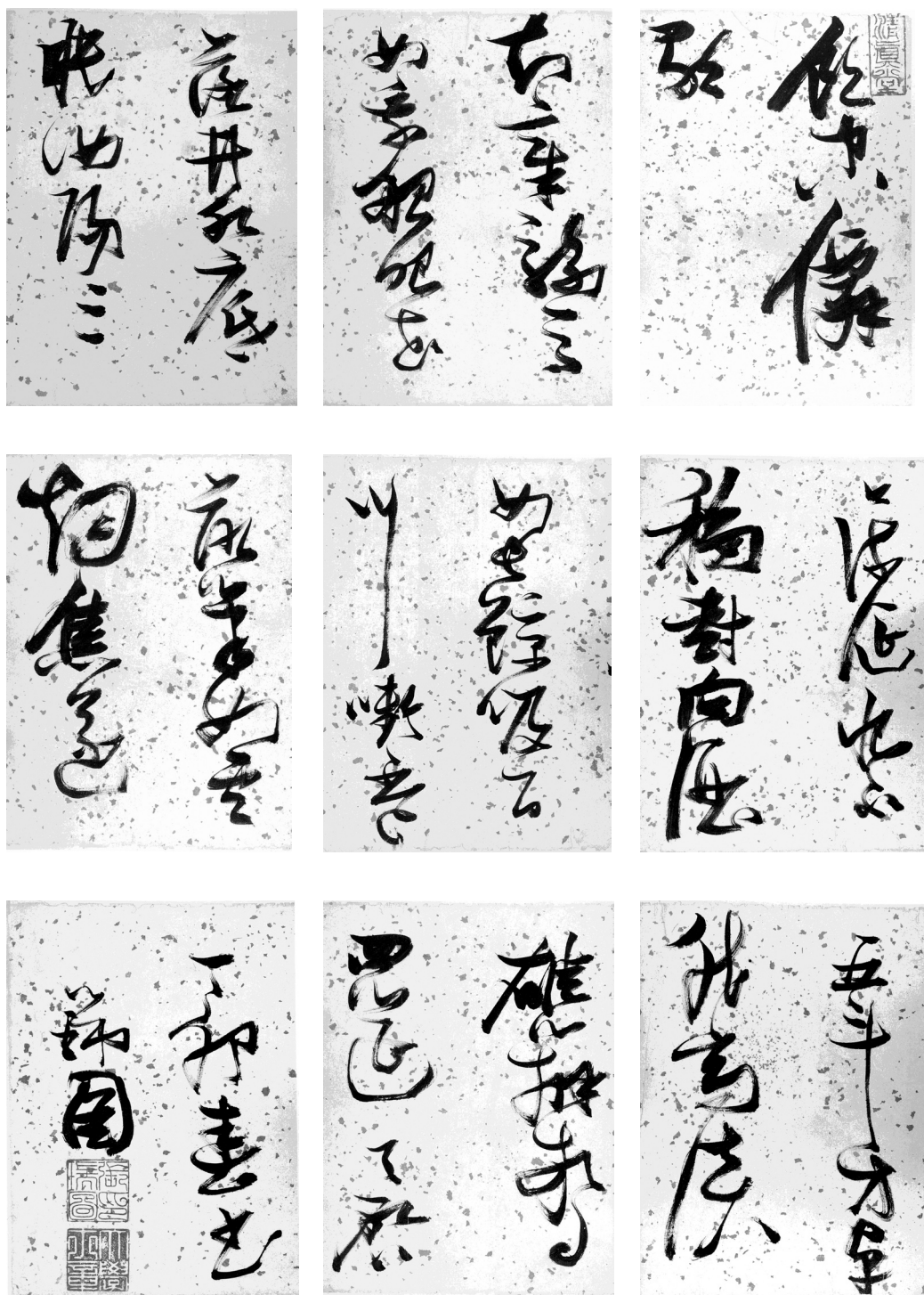


圖15 張瑞圖 《草書杜甫飲中八仙歌詩卷》 1627年 藏地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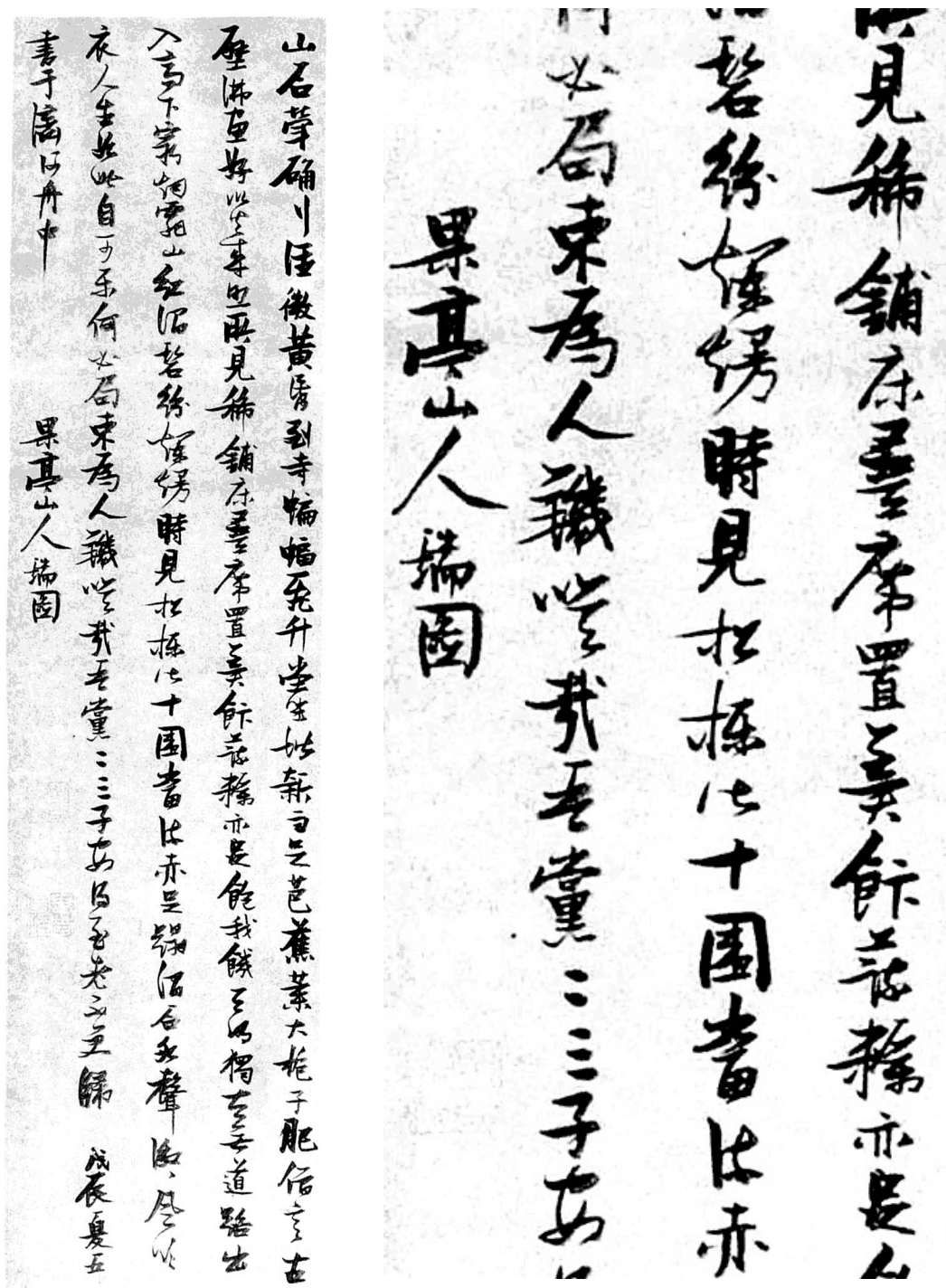


圖16 張瑞圖 《行書韓愈山石詩軸》 1628年 常州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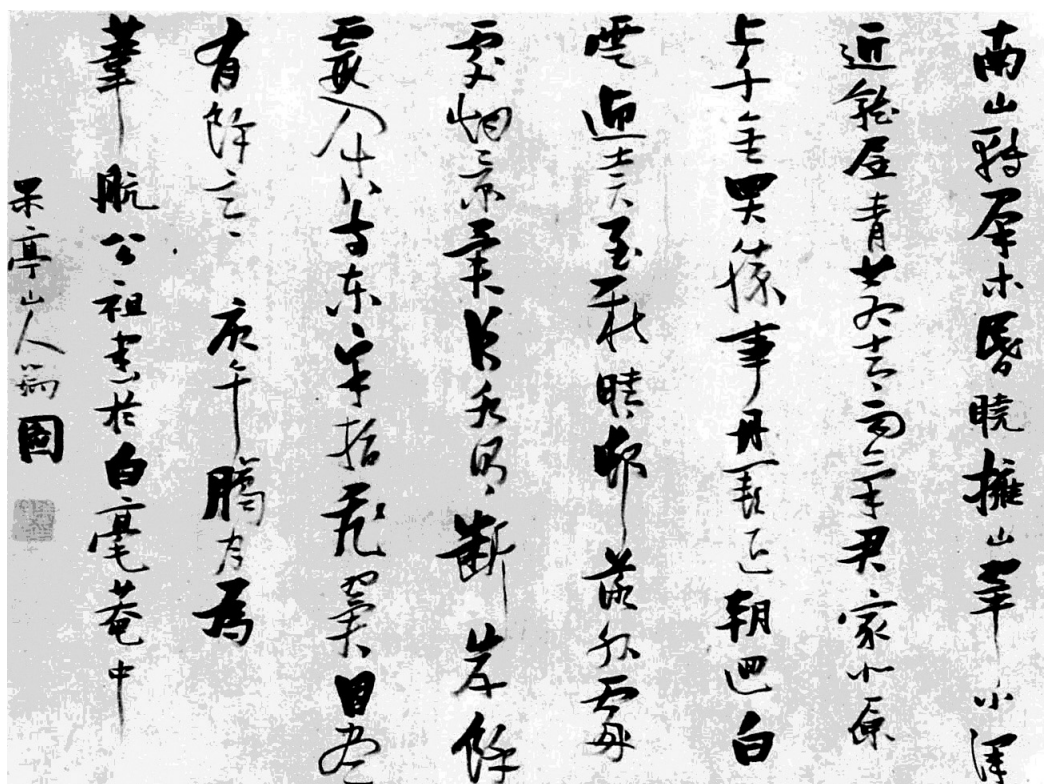


圖17 張瑞圖 《錢起李祭酒別業俯視川林前帶雪岫詩軸》 1630年 藏地不明

Chang Jui-t'u's (1570-1641) Gift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Semi-Cursive Script Calligraphy

He Yan-chiuan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s one of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Late Ming Chang Jui-t'u, has, because of his unique style of Semi-Cursive Script calligraphy, already receiv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with substantial findings generated from this research. Still, there has been no revision or clarification of the origins of his style to date. This article open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deas raised in past research on Chang Jui-t'u, highlighting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methodologies,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what relationship might exist between Chang's calligraphic style and the ideas espoused in Sun Kuo-t'ing's *Essay on Calligraphy*. The essay continue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Chang Jui-t'u's activities with regard to gift or occasional calligraphy and considers the role and capacity of calligraphers and calligraphy in late Ming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s calligraphic style and the changes of his brush method over time, the author points out how his participation in creating gift calligraphy pieces produced a concrete influence on Chang's Jui-t'u's writing practices as a whole, gradually culmin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ndividualistic, distinctive style.

Keywords: Chang Jui-t'u, *ying-ch'ou shu-fa*, gift calligraphy, Sun Kuo-t'ing, *Shu-p'u*, *Essay on Calligraphy*, Four Masters of the Late Ming